

棱天下

北京政变之后的冯玉祥

许 述

冯玉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去世后多次受到中共高度评价。冯玉祥遇难当年和诞辰100周年，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通过致悼词的方式高度赞扬这个“朋友”。冯玉祥真正引起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注意，乃是他导演了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

得到苏共的武器支援

苏共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最先去北京找吴佩孚，可惜吴已经和英国人来往密切，于是又到广州找孙中山。只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势力局促在广东一隅，所以，苏共还想在北方再找个朋友，在北京政变后锁定了冯玉祥。苏联决定支持冯玉祥，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是国家利益。苏共取得政权尽管已有8年，但仍然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外交上打不开局面，希望争取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冯玉祥也正想就近找苏联做靠山。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向冯玉祥的部队援助武器装备和派遣顾问团及教官的决议。后来，日本和苏联互相较劲，张作霖决定以武力解决冯玉祥部。冯玉祥自知不敌，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想让对方失去动武借口。政变果实落到别人手里，冯玉祥自然不甘心，想亲自到莫斯科争取更多军事援助。不料，冯玉祥走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国内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冯玉祥的部将，时任京畿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未阻止警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使苏共怀疑冯玉祥的革命精神，遂让他暂缓赴苏。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终于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和莫斯科卫戍司令迎接，规格不可谓不高。接下来的3个月，苏共为“赤化”冯玉祥，

汪、蒋策动北伐时，冯玉祥在西北

可谓煞费苦心。一是不少高级领导人都会见了冯玉祥；二是为冯玉祥安排大量参观活动，让他看到苏联军队强大，经济发达，人民幸福；三是对冯玉祥进行再教育。为了使冯玉祥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苏共特别安排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去做工作，包括蔡和森、刘伯坚等。冯玉祥抵达苏联前，所属国民军已被奉军逼出北京。身在莫斯科的冯玉祥得知消息，心急如焚，可他想要的武器装备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3天后，苏共有所松口，加之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冯玉祥认为自己扩张的时机到来，于8月17日启程回国。9月16日，冯在绥远西部的小镇五原誓师，与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苏共对冯玉祥的表现十分满意，增加了援助力度：子弹2735万余发，步枪27970支，机枪140挺……之前，冯部还在使用1871年的山炮，1902年出厂的步枪是冯军最新装备，枪筒都生锈了；之后，这些苏联新式武器至少可以装备40万人的部队。

回国之初，冯玉祥言必称马列，还在会议室挂列宁像。其实，他在骨子里根本不认可苏联模式，更担心苏共顾问团控制自己的部队。在所需武器装备到手后，冯玉祥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都发表了不少“反赤”言论。最后，苏共失望地发现，“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期的目的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的希望犹如肥皂泡破灭了”。更糟糕的是，苏共不久发现自己被利用了。冯玉祥羽翼丰满并渡过危机后，尤其是国共合作破裂后，抛弃了苏共，转而与汪、蒋另结新欢，并驱逐共产党人。

与中共的三次合作

响应。随后，冯玉祥邀请共产党人到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如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等。中共认为冯玉祥是穷苦出身，对冯期待甚殷。不过年轻的中共似乎没看清冯玉祥与自己合作的真正原因：1926年4月至5月，20万冯军被50万北洋军打得一败涂地，唯有通过中共与苏共取得联系，弄到枪炮才能渡过难关，撑到北伐军到来。换句话说，冯玉祥把共产党请进军营不过是权宜之计。果然，中共不久就被下了逐客令。原来，蒋介石于1927年6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共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

孰料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输得精光，此后，他四处活动，联络一切反蒋力量。为寻求中共支持，他不仅在口头上对过去的错误行为作了深刻反省和检讨，还用实际行动为中共提供支持。冯玉祥在1926年求助中共，1927年又翻脸不认人。在中共看来，中原大败后的冯玉祥只是一个失意军人，不过，考虑到冯玉祥在北方还有不小的影响，也有不少旧部，中共为在北方建立新苏区，再度与冯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公开指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对日投降的卖国行为，欲逼蒋下野，为自己复出创造条件。1933年，冯玉祥利用旧将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有利条件，到张家口主动请求中共协助建立抗日同盟军。与1926年跟中共首度合作相比，冯玉祥这次谈判的资本少多了。冯玉祥除了把军队政治工作交给中共，部分军中要职也让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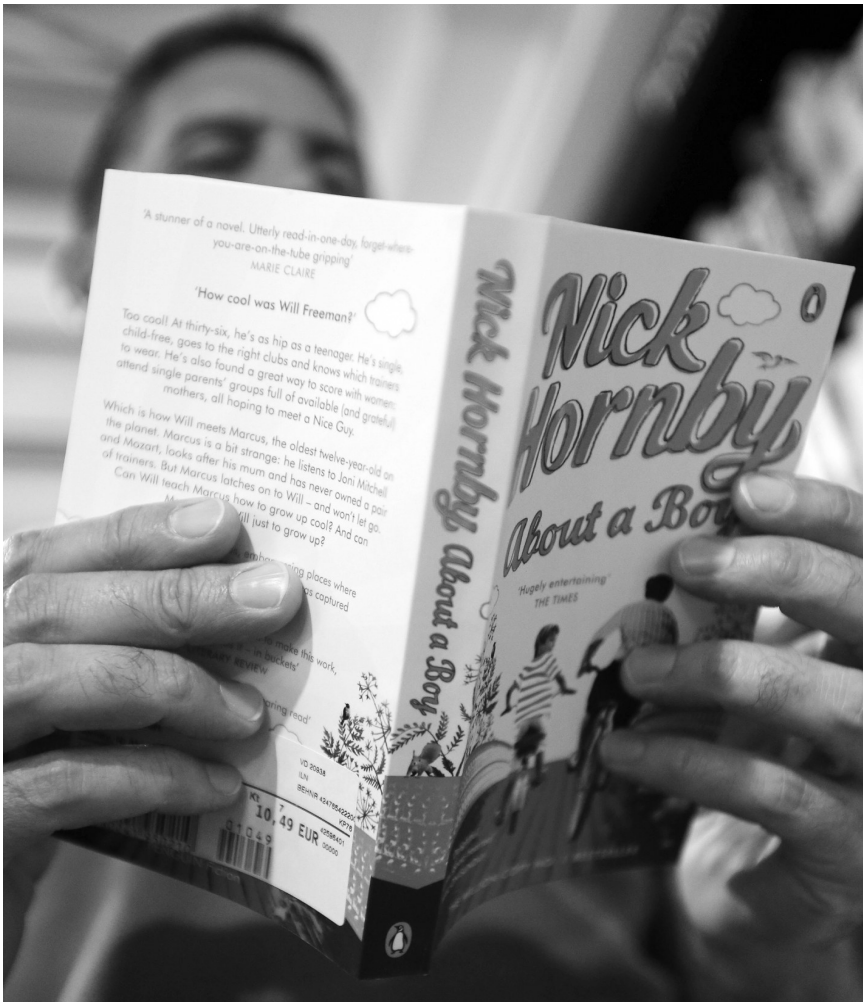
当时，双方的合作是秘密进行的。

时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的柯庆施受饶漱石（主持中共在白区的工作）委派，到张家口执行临时中央“左倾”路线，以“反蒋”取代“抗日”，还在同盟军中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冯玉祥深知这会招来蒋介石的重兵，遂加以抵制，结果被骂成“反革命的在野派”“具有欺骗性的最危险的敌人”。蒋介石本来就对冯违反中央政策“单独抗日”不满，而今，中共在冯部公开活动，蒋介石马上以“讨共剿匪”为名，派出16个师进攻察哈尔同盟军。冯玉祥内外受压，不得不宣布取消同盟军番号，再次离职下野。就这样，双方第二次合作以不愉快和不成功的结果惨淡收场。

如果说在第一次合作中，冯玉祥对不住中共，那么在第二次合作时，中共也有过错。现在，谁也不欠谁，这为双方第三次合作提供了可能。

1936年9月18日正逢“九一八”五周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通过媒体，再次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场。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冯玉祥后，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表达合作抗日意愿。冯玉祥六十大寿，中共旗下的《新华日报》专门辟出整版刊登贺词。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动登门拜访冯玉祥。不久，冯被蒋赶到美国，心灰意冷，中共因此接近。接着，冯在美国四处发表演讲，揭蒋的丑，还在1947年底跑到美国议会作证两个多小时，使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的经济援助缩减了2/3。1948年7月辽沈战役前夕，中共邀请冯玉祥回国助一臂之力。冯取道苏联返回，不料其所乘“胜利号”于9月1日在黑海失事，冯亦身亡。

（节选自《温故》，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近日，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正式宣布已与英国培生集团签署最终协议，双方将合并各自旗下的兰登书屋与企鹅出版社，以组建世界最大图书出版公司企鹅兰登书屋。图为德国法兰克福一家书店的工作人员翻阅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每一次细微的开掘都很宝贵

——评杨波著《刘向著述研究》

王佳泉

是一种史学、哲学、文学等等涵容混杂于其中的杂文学或大文学，直到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才迎来自觉的时代，才有了真正的纯文学。而刘向及其所处的汉代正是中国文学由涵容混杂走向自觉纯正的酝酿生成的中间环节。杨波的著作通过梳理与比较，清晰而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刘向著述在其中的典范意义。正像她在书中所说的那样：“随着《史记》以列传的叙事记事记人，‘传’的含义从经学向史学乃至文学转移。它的叙事功能在不断强化，同时说理意味则逐渐淡化，作者的意旨倾向隐含在叙事过程中。”也就是说，如果说《韩诗外传》是解经传道的经学之作的话，《列女传》等的改写已经是史传体的史学乃至文学之作了，并由此开启了此后直至《世说新语》等小说的创作。此外，著作还对《韩诗外传》的经学用诗、解诗到刘向著述的

引诗证史，再到“依兴古事，悼已及同类”的诗歌创作自觉的勾勒也甚为详实可信。时下的国学研究正热，堪称风起云涌。然而，正像徐友渔先生在《国学应该怎样热起来》、《“国学热”的浅层与深层问题》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而像杨波这样的学者们并不是预先抱定了“尊孔读经”的先入之见来翻新民族文化上的特产的，而是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来审视和检索传统文化的祖师与细胞的。她们每一次哪怕细

微的开拓与掘进都将构成民族文明进步的积累与沉淀，而这也正是此类国学研究实绩的新收获的难能与宝贵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正像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多次指出的那样，在相当多的一些热心国学研究的人那里，有一种添字解经、牵强附会的不良风气。就是说在解释阐述传统经典的时候，不是实事求是地求解经典的本意，而是大搞托古改制、六经注我式的随意引申生发，导致许多问题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想一想，正不知还有多少涂抹在传统文化身上的污泥和油彩正等待着类似《刘向著述研究》这种朴实无华的国学研究实绩来一点一滴地揩却呢。就这一点来讲，杨波无疑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杨波著《刘向著述研究》已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南联大行思录》

本书是作者浸润于“西南联大”的成果。其间，作者走访海峡两岸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交谈，积累案头笔记、文献等众多一手材料，甚至不乏独家所有。作者寻访西南联大老校友，目的在于寻访西南联大精神——在中西合璧下，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也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本书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对话穿插其中。在一个个专题内，可见西南联大人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更可见出作者对当下文化教育建设的思考与忧虑。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出版）

《帝制的终结》

此书是作者集50年辛亥革命研究功力而创作的作品，全景式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简明而不失重点地说明了辛亥这一段历史中，从当权的载沣、袁世凯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持各种政见的人物的活动脉络。全书充满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内容并不是陈旧的史料铺陈，而是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作者采择众说而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处处可见他犀利独到的观点。

（杨天石 著 岳麓书社2013年6月出版）

《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本书紧紧围绕“中国出版的革命”，剖析了新时期以来出版业发生的重大变迁，敏感关注出版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考察了出版理念和出版组织的变迁、消费行为与发行渠道的变迁以及出版技术与媒介载体的变迁，对移动出版、口碑式营销等新媒体传播等给予了专业审视。

（何明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社交网络改变世界》

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力作，作者就Facebook、MySpace、维基百科、YouTube、Twitter等在全球汇聚了数十亿用户的热门网站进行深入研究，向广大读者全面解读社交网络正在如何改变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两位作者结合社交网络中发生的数十个经典案例，深入剖析社交网络中的三大现象：身份日益多元化、地位日益民主化、权力日益分散化，为读者清晰描绘出这些变革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并为这些发展趋势指明了方向，对理解这场变革具有启发性。

（【加】马修·弗雷泽【印】苏米特拉·杜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走读京城角落》

这本书讲的是隐藏在京城犄角旮旯里的一些故事。北京这座城市很大，犹如一部厚重的大书，帝王宫殿、皇家园林、街巷胡同、寺庙道观、名人故宅、百姓民居，每一处景致，都如同这部大书中的一页，有无数诱人的故事隐舍其中。一路走去，有趣而惬意。

（陈光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出版）

《骑鲸之旅》

怎样让孩子从小爱上阅读，这是很多父母的难题。这是一本教家长怎样为孩子挑选绘本，如何一起阅读绘本的书。本书作者通过自己在共读过程中跟孩子斗智斗勇但不失温馨的经历，告诉所有父母：亲子共读的第一个成果，其实是失败，但只要父母像辛勤的农夫翻动土壤那样翻动绘本，孩子们一定会从灵魂里开出热烈的花来呼应。（蔡然 著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